

朱舜水集

上冊

中華書局

朱
舜
水
集

上
冊

中
華
書
局

朱
舜
水
集

下
冊

中
華
書
局

朱 舜 水 集

(全二册)

朱 舜 水 著

朱 謙 之 整理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27⁷/₈。印張·577千字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6,400册

統一書號：2018·174 定價：3.1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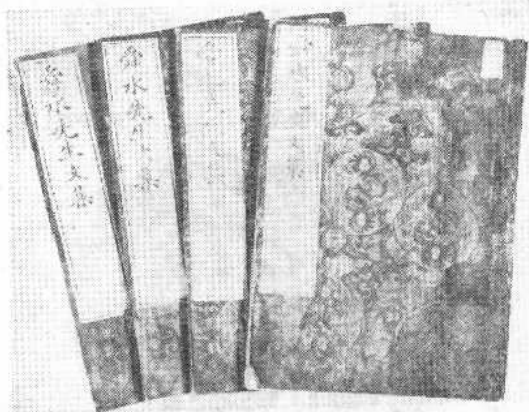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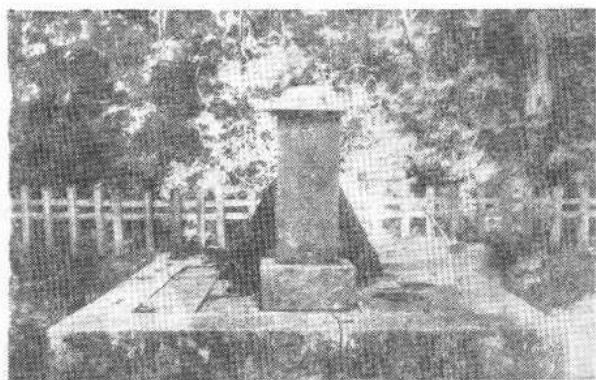
朱舜水畫像 名古屋藩主德川光友筆 絹本墨書
日本名古屋市德川美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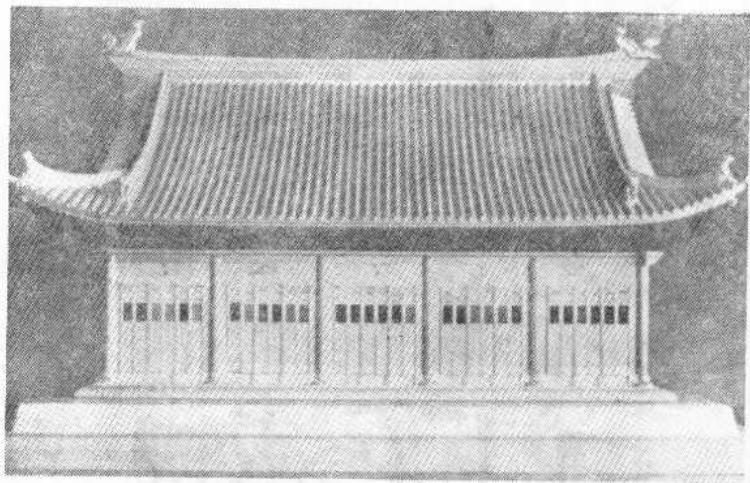
朱彞水畫像 長谷川等善筆 紙本淡彩

日本水戸市彰考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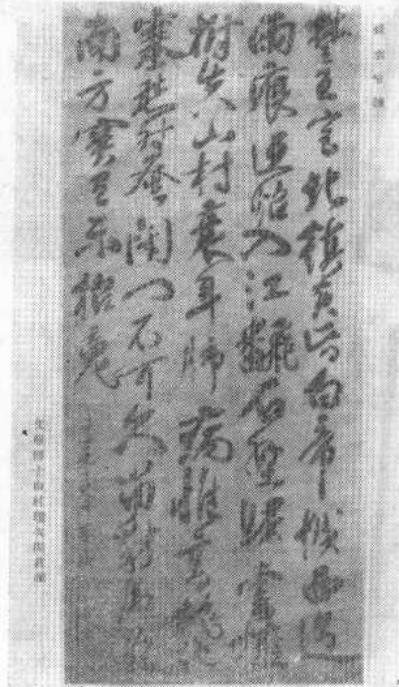
朱舜水墓（據稻葉本）



書影（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書攝）



朱舜水指導製之 大成殿模型 日本水戸市彰考館藏



朱舜水墨蹟（據稻葉本）

出版說明

一

朱之瑜（公元一六〇〇年——一六八二年，明萬曆二十八年——清康熙二十一年），浙江餘姚人，寄籍松江，字楚嶼，到國外後，復字魯瑣（據《餘姚縣志》、《姚江詩存》、《海東逸史·朱之瑜別傳》及稻葉本凡例），晚年到江戶（今東京）後，又號舜水；明諸生，崇禎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及南明弘光元年（公元一六四五年）兩次奉詔特徵，不就，故稱徵君；另被薦舉孝廉一次，立刻疏辭，又崇敕特召一次；另先後八次授官，均不受。

南明弘光元年因特徵和授官不就，臺省交章論劾，朱之瑜爲免于逮捕，不別家人，逃往舟山。此後，他從事抗清活動，奔走、流落在浙江、福建沿海和日本、安南、暹羅，先後達十五年。

順治十六年（公元一六五九年），他參加鄭成功軍攻打長江下游諸城，失敗後，眼看復明無望，又去日本。在他的學生安東守約等的連署請求下，經過近一年的時間，得到日本當局的准許，開始在長崎定居。從一六五九年冬到一六六五年六月，他住在長崎。水戶上公源光國（德川光國）聘他爲賓師。從一六六五年七月起，他移居江戶。在這裏，他教授了更多的學生，在中日文化交流上產生了更大的影響。他一直穿着明代的服裝，嘗說希望死後他的棺材有一天能遣回故土。一六八二年四月，他老

死在江戶，年八十三歲。他從六十歲起，在日本居住二十二年。

朱之瑜在國內時的著作保存下來的很少，只發現有《泊舟稿》詩十五首，載清乾隆三十八年張廷枚編的《姚江詩存》中。這些詩已收入一九一二年日本出版的稻葉君山編的《朱舜水全集》（稻葉本）中。一六五七年（清順治十四年），他住在安南時，曾被安南國王召去供役三個多月，他將經過情況記述在《安南供役紀事》中。一六六一年，安東守約問明室致亂之由及恢復兵勢，他撰寫《中原陽九述略》，交安東守約收藏，說是「他日采逸事于外邦，庶備史官野乘」。一六七〇年，他應源光國之請，作《學宮圖說》。源光國「使梓人依其圖而以木模焉，大居其三分之一。……梓人所不能通曉者，先生親指授之」（《舜水先生行實》）。一六七二年，應源光國之請，他寫了《改定釋奠儀注》，「上公使先生率儒學生習釋奠禮」（同上），使學者明瞭和熟習立學祭孔的禮儀。《學宮圖說》（說明文字為日文）和《改定釋奠儀注》（中文）均收入安積覺編的《舜水朱氏談綺》中。朱之瑜的其他著作都是他在日本時的書信、問答、讀書批注及其他文章。他的文集由水戶侯源光國輯，其子源綱條校刻，于一七一五年第一次在日本出版。

朱之瑜是明清之際出生於地主家庭的進步思想家。他受時代思潮的影響是很明顯的。他在《中原陽九述略》的「致虜之由」及其他文篇中，揭露明末政治的腐敗，官吏「魚肉小民，侵牟萬姓」，「搢紳罪貫滿盈，百姓痛入骨髓」；揭露科舉制度下所謂讀書，「惟以剽竊爲工，掇取青紫（貴官）爲志」；他反對滿族貴族的民族壓迫政策，列舉了「虜害十條」，總結了明朝滅亡的經驗教訓。他反對佛教。他表面上尊崇程朱，實際上反對理學。他說：「宋儒之習氣不可師也」（《答加藤朋友問》）；「宋儒……終不曾做得一

事」(《與安東守約書》十)。他對王學攻擊尤力。他說，王守仁「固染于佛氏」，「專主良知，……反以偽學爲累」(《答佐野回翁書》)。他主張學習「聖賢之道」，對程朱理學要「取其精意」(《答某書》)，爲學要「有關於國家政治」，要「能變化於民風土俗」(《答小宅生順問》)。他幾次提到，朱熹力詆陳亮，「議論未必盡然」(《答奧村庸禮書》十一)。他的這種經世致用的思想，在日本講學時曾廣爲傳佈，並體現在他的實踐上。

當時日本處在封建時代，佛教盛行，儒學者大都信仰程朱理學。他在講學時，主張立國學，傳授「聖人之學」。他還介紹了中國的服制、禮制、官制、學制、科舉制度等。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可以理解的。據《大日本人名辭書》德川光國傳記說，他到江戶後，光國「親執弟子禮」。舜水時諫光國，其言剴切，光國每納之」。由此更可看出他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舜水曾說：「不佞視貴國之人如一家昆弟父子。」(《答奧村庸禮書》八)這說明他不以大國自居，而是平等相待。他希望「大明(中國)與貴國(日本)世世和好」，表示願意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自己的貢獻(《答安東守約書》二)。這種精神是很可貴的。

朱舜水著作是中日文化交流的記錄，是中日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歷史見證。我們希望，《朱舜水集》的整理出版，能够對於中日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歷史的研究有所幫助，對於中日兩國人民友好和文化交流的發展有所促進。

二

《朱舜水集》是北京大學教授朱謙之先生一九六二年整理出來的。他把稻葉君山編《朱舜水全集》的全部內容重新加以編排，並根據中日幾個版本做了校勘（詳見凡例），寫出校勘記，初步加了標點，在正文中補入了《犀角杯銘》一文，在附錄中補充了由中日文書籍中搜集的一些可供參攷的材料。

朱謙之先生已經逝世。我們在出版前，曾經請楊天石同志對整理稿進行過加工。楊天石同志為人名、地名、書名加了標線，對書中的引文加了引號，改正了一些點錯的地方，分了段，還提出了一些校勘方面的意見。我們又請徐壽齡同志對稻葉本核對整理本篇目和進行校勘，他在校勘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也改正了標點中的一些錯誤。我們又在上述基礎上進行了編輯工作，計刪除稻葉本中重複的書簡六篇、問答一篇；對書簡的排列次序稍做了一些調整；問答類整理稿將問答內容全部按人歸併在一起；我們又按水戶本的分卷分為四個部分；對少數文篇分類不盡合理的做了改變；根據朱謙之先生寫的校勘記和楊、徐兩同志提出的校勘意見，以及新發現的錯字，在有關的地方，寫了校語（校勘中我們還曾對勘一九三六年世界書局據馬浮改編的《朱舜水遺書》整理重印的《朱舜水全集》^①，簡稱世界

① 上海羣學社一九二六年出版許嘯天整理的《朱舜水集》一冊，分五卷，卷一為傳記，卷二為文章集，卷三為講學集，卷四為議論集，卷五為《陽九述略》。多係選自《舜水遺書》的論學的文章。全書份量不大，但《雜說》與《策問》均重見。書中進行了標點、分段，但排印錯字不少，且有把不同文章接排在一起的情況。我們沒有據以進行校勘。

本），朱謙之先生校勘記以外的校語和按語，均冠以「編者按」字樣，以示區別；補入了整理稿遺漏的文章八篇，問答兩條；將原收入附錄的郭垣撰《朱舜水年譜》，更換為更有參攷價值的梁啟超撰《朱舜水先生年譜》；刪去附錄五中與朱舜水關係較小的人物傳記四篇；補入了《明朱徵君集》（加賀本）的凡例、《朱舜水全集》日文凡例，以及《大日本人名辭書》中德川光國的傳記材料。除個別異體字改為正體字，以便利讀者外，一般均未予改動。整理稿原分作二十九卷，經合併減少了兩卷，附錄原分做五卷，現編為附錄一至五，不列卷次。全書計共二十二卷，另附錄五部分。因為不可能再同整理者商量，這些改動只能由編輯部負責了。

另外，凡據稻葉本以外各書增補的各篇，我們在目錄中篇題下一一加了星號，以示區別。

《朱舜水全集》的日文凡例和《大日本人名辭書》中德川光國傳記材料，是請李思敬同志譯出的。後者我們略作刪節。

朱舜水詩十五首是本書收入的他在國內時期的僅存作品，其中若干文字稻葉本與一九一三年出版的馬浮據稻葉本改編的《舜水遺書》互有出入。我們函請南京圖書館查核《姚江詩存》，訂正了兩版本中各自的錯誤，謹向他們表示感謝。

我們在編輯工作中的疏漏和錯誤可能不少，熱切地歡迎廣大讀者和日本朋友指教，以便改正。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〇年三月

前言

中國和日本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兩國人民之間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的歷史。中日的文化使者不辭艱難險阻，爲促進中日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作出了貢獻，其中突出的有吉備真備（約六九四——七七五）、阿倍仲麻呂（晁衡，七〇一——七七〇）、鑒真（六八八——七六三）、最澄（七六七——八二二）、空海（七七四——八三五）等。朱舜水也是其中的一個。舜水的事迹，在日本雖然流傳很廣，但在中國，由于清朝的忌諱，反而沒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朱舜水是明清之際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這一時期階級矛盾空前尖銳。在明朝末年，由于統治階級殘酷的政治壓迫和沉重的經濟剝削爆發了一系列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李自成所領導的農民革命軍于一六四四年攻占了北京，推翻了明朝的腐朽統治。但農民起義的勝利果實却爲滿族貴族和漢族地主階級的聯合政權——清王朝篡奪了去，使民族矛盾空前尖銳。各地開展了漢族和各兄弟民族抵抗滿洲貴族統治者的武裝鬥爭。殘存在閩浙一帶的南明政權的當權者仍然結黨營私，爭權奪利，敵視起義的農民軍隊，最後他們都以失敗告終。

朱舜水的生平事迹，在中日史籍中有各種記載。〔注〕舜水（一六〇〇——一六八二）名之瑜，字魯

〔注〕詳見今井弘濟《安積覺合撰：〈舜水先生行實〉》；《海東逸史》載《朱之瑜別傳》；邵念魯著：《思復堂文集·明遺民所知錄》；光緒二十五年修《餘姚縣志》；《碑傳集補》卷三十五；《清史稿·遺逸傳》卷五〇五等。

璦，明浙江餘姚人，寄籍松江，出身于沒落地主階級。自云「大明未亂之時，合天下之縉紳，惟僕家獨貧」（《與某書》），又《與諸孫男書》中說：「汝曾祖清風兩袖，所遺者四海空囊，我自幼食貧，蠶鹽疏布……」青年時曾隨東閣大學士張肯堂（此人在一六五一年清軍進攻舟山時血戰而死）學習，深受張的影響。一六五四年，南京被清軍攻占，張肯堂等奉唐王聿鍵爲帝，建立福建的南明政權，朱舜水曾去依附。他與舟山守將王翊等「密定恢復之策」，多次去日本借兵，但都沒有成功（《舜水先生行實》）。後來舟山失守，王翊殉明王朝，朱舜水亡命日本、越南、暹羅等國。但他常潛回內地，繼續進行抗清的活動。一六五八年南明將領鄭成功和張煌言會師入長江時，朱舜水應鄭成功之招，參加了北伐，「常往來兩軍間，克瓜州，下鎮江，皆親歷行陣。」（《朱之瑜別傳》）鄭成功失敗後，朱舜水鑒於復明的希望已成泡影，便決心定居日本（時爲一六五九年，南明永歷十三年，日本萬治二年）。當時日本幕府嚴行海禁，不准外人入境，但對朱舜水是個例外。朱舜水抵日，先在長崎講學，後應水戶藩主德川光圀（國）的聘請，移居江戶（今東京）。德川光圀尊朱舜水爲師，經常詢問有關國家施政大計、禮樂典章制度、文化學術問題，備受優渥禮待。朱舜水在日本二十二年，和日本各方面的人士都有所接觸，與日本學者廣泛地探討各種學術文化問題，並招收學生，講授中國傳統文化，對兩國文化的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卒年八十三歲，學者謚爲文恭先生，葬於常陸久慈郡大田鄉瑞龍山（見本書附墓碑照片）。

明清之際，我國佔統治地位的官方思想體系是程、朱一派的客觀唯心主義，另有陸、王一派的主觀唯心主義與之抗衡。明亡以後，有不少的進步思想家在總結明朝滅亡的經驗教訓時，對這兩大唯心

主義流派進行了批判和總結。朱舜水也從這方面進行了總結。他指出程朱理學是一種脫離實際，虛偽浮夸，「純弄虛脾，捕風捉影」的學問（卷八《答奧村庸禮書十一》）。他說：「宋儒辨析毫厘，終不曾做得一事，況又於其屋下架屋哉？」（卷七《與安東守約書十》）又如他批評朱熹的形式主義說：「『足容必重，手容必恭』，《禮》特言其大要耳。自朱子言之，儼然泥塑木雕，豈復可行於世！」（卷七《答安東守約書二十》）他進而認為，程朱研究性理，於己於國，皆無裨益，反而有害。他說：

「若欲窮盡事事物物之理，而後致知以及治國平天下，則人壽幾何，河清難俟。故不若隨時格物致知，猶為近之。……僕謂治民之官與經生大異，有一分好處，則民受一分之惠，而朝廷享其功，不專在理學研窮也。」（卷十一問答三《答野節問》）

朱舜水對唯心主義的陸王一派也進行了揭露和批判。他評王陽明說：

「問：陽明之學近異端，近世多為宗主，如何？」

答：王文成亦有病處，然好處極多。講良知、創書院，天下翕然有道學之名；高視闊步，優孟衣冠，是其病也。……其徒王龍溪有《語錄》，與今和尚一般。其書時雜佛書語，所以當時斥為異端。」（卷十一問答二《答安東守約問》）

又說：

「王文成為僕里（小同鄉）人，燃燈相照，鳴鷄相聞。……官大司馬，封新建伯。後厄於張璁、桂萼、方獻夫，牢騷不平之氣，故托之於講學。若不立異，不足以表見於世。故專主良知，不得不

與朱子相水火，孰知其反以偽學爲累耶？愚故曰：『文成多此講學一事耳。』（卷五《答佐野回翁書》）

朱舜水對陸王派的批評主要是針對他們講良知、言心性的主觀唯心主義。他和當時另一個思想家顏元一樣，指出王陽明的致良知是「援佛入儒」。實際上陸王的唯心主義是把佛教的唯心主義還原爲世俗的唯心主義，它們的本質是一樣的。

關於朱舜水的爲學宗旨，曾長期被人誤解。例如邵念魯《明遺民所知錄》略稱：「之瑜……留東京。自國王以下，咸師奉之。……闡良知之教，日本於是始有學，國人稱爲朱夫子。」近人也說：「舜水先生亡命日本，傳王學於彼邦。」但朱舜水自己在給日本某人的信中說：「本非倡明道學而來，亦不以『良知赤白』自立門戶。」（卷五《答某書》）從上面的態度以及他自己的言論中都可以看出，他對宋明的唯心主義理學都不滿意。

朱舜水在反對宋明理學的基礎上提出了「實理實學」的主張。他認爲「實理」就是「明明白白，平平常常」的「現前道理」，凡是能取得實際功用與事功的就是實理。他認爲一種理論要看它的實際效果。有實際效果的，就有價值。「爲學當有實功，有實用」。「吾道之功，如布帛菽粟，衣之卽不寒，食之卽不饑，非如彼邪道，說玄說妙，說得天花亂墜，千年萬年，總來無一人得見。」（卷十一問答四《答小宅生順問》）因此，他說：「學問之道，貴在實行。」「聖賢之學，俱在踐履。」（卷十問答二《答安東守約問》）他對知和行的關係沒有說得很清楚，但是他承認實「行」是主要的，學問不在於空談。這種觀點具有唯物主